

理响广东·马院院长谈

栏目主持 李妹妍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中原：

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赵中原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中央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如何准确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如何更好地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本期“理响广东·马院院长谈”，羊城晚报专访了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中原教授，深入解读“国家治理现代化”。

羊城晚报：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有之义。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赵中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同时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只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不断强化党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这一系列重要阐释，为我们正确把握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立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任务新特征新要求。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改革从渐进性、局部性、探索性改革，迈入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的新境界。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着两个基本义项，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含制度体系与治理机制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则强调对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呼应，包含制度设计能力、制度执行能力和制度发展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推进

的基本原理、立足新时代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战略设计的逻辑，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历史答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不断深化以执政能力为重点的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建设，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进程，最终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中。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推动下形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百年奋斗目标”“民族伟大复兴”相辅相成的逻辑进路与发展格局。

推进党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题中之义，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得以有效推进的决定性要素。提升党的治理能力，在于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方法论要求，不断提升党协同国家治理诸要素关系，以发挥党的领导、政府宏观主导、市场流动性引导以及日益“引导”，为治理能力提升创造条件。治理能力更着重于治理艺术的形成，即从各种技术、机制和策略的博弈中，将系统工具在实践中进行艺术化的高效灵活运用，以实现各种治理主体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和包容共生，以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羊城晚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党的领导”？

赵中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要求。

一是强化国家治理整体层面的科学运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必须着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条件与目标要求，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从三个层面加以推进，即把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内在联系，坚持一体化推进；注重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相统一，坚持定向推进；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坚持科学推进。

二是优化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有效供给。国家治理水平取决于制度供给能力。一方面，需要从我国既有制度形成的内在逻辑出发，对党的领导制度和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法治与德治、民主与集中等制度安排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规范；另一方面，从制度建设的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作出系统部署，形成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相互衔接的体制机制框架。

三是促进国家治理技术层面的机制协同。推进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有机统一，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治理运行机制的创造性建构，也是实现治理方式与环节的无缝化对接、立体性交织和全方位协同的科学选择。系统治理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多元治理主体作用的有机统一；依法治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和协调社会关系；综合治理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和综合运用各种合法有效手段提升社会治理成效；源头治理强调通过标本兼治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种苗头性矛盾和问题。

四是国家治理操作层面的多向引导。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需要科学处理好治理末梢问题，让治理成效真正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一是明确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清单，切实把向上级组织负责和针对基层社会问题主动作为统一起来；二是注重调动基层群众参与治理的主观能动性，推进基层自治治理与实践的有序发展；三是完善微观治理的立法与执法，把明晰法规与维护法律法规权威统一起来；四是在具体方法运用上，探索建立起相互呼应的激励相容机制、治理制衡机制、政策传导机制、应急救济机制，以此提升微观治理成效。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李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造性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为各类市场主体稳定健康发展注入了信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通过有政府和市场有效协调配合，畅通市场循环，促进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必须提振信心与外信信心：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同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多领域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绝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注意把握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向，决不能让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走向否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去国有化”搞私有化捷径；也决不能忘记历史教训而忽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作用，甚至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相互依存的，二者不能偏废，不能以限制、牺牲一方去支持另一方。只强调公有制经济发展而忽视或牺牲非公经济的发展是不对的，只强调非公经济的发展而忽视或牺牲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对的。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应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应该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新时代，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举措，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更加广阔的机遇空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竞相迸发，让各种所有制经济更好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形成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中国经济才会有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拥有光辉灿烂的未來。

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出发，以供给的优化为主线，把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及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有效性，最为关键的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通过有政府和市场有效协调配合，畅通市场循环，促进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必须提振信心与外信信心：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同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多领域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少数人的富足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和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财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国有企业贯彻执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深化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努力，把蛋糕做大做好，再通过合理的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把蛋糕切好分好。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都发挥起来。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营商环境，依法监管和执法。促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和发展。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土地使用权及其他自然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依法享有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的权利。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厘清政企交往定位，规范政商交往行为，通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为主的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放管服”为主的行政体制改革，根本目的是解决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该放的要放，该管的要管好，公共服务要加强度和提升。不能滥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宏观指导不能异化为行政干预。与此同时，政府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活动及公共服务方面必须尽到必要的组织、促进、调控和监管职责，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履行职责一定要在法律轨道上办事，即监管和执法都必须依法进行。加强与市场主体沟通，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协调性、系统性。

准确理解、深入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消除“所有制歧视”，必须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维。在认同法律规定、市场规则的基础上，应更多地从市场主体一般规律出发，来看待各类企业面临的经营发展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以国有企业来划界，后者极易陷入关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讨论怪圈。从市场主体一般规律来看，企业规模有大、中、小、竞争力也有强、弱，它们分布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其生产规模、实力强弱也会随着市场环境和经营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应对市场变化，从政府来讲，应当紧跟形势变化，及时完善政策并加以落实；从企业来讲，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因时调整战略和策略应对，消化相关风险因素，方能基业长青。

（作者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朱昌俊

深圳对路边摊开口子 引领新的城市治理思维

近日，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拟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其中，一处细节引发广泛关注——修订后的条例允许街边摆摊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

众所周知，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一二线城市路边摊经历了一个从快速兴起逐步退场，乃至消失的过程。在不少一二线城市，时至今日已难觅路边摊的身影。这是因为在很多城市的市容管理要求更严格后，本身就相对边缘化的路边摊逐渐被视为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往往与“妨碍市容市貌”联系在一起，于是被划入禁止之列。

实际上，路边摊看似“低端”，但却与居民的生活便利和城市烟火气息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城市就业空间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有着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的内生规律作支撑。像淄博烧烤火出国后，就离不开当地城市管理对于烧烤摊位的包容。“一刀切”地禁止，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管理思维。过去很多年，城管与路边摊经营者的执法纠纷并不鲜见，也反映了这种城市管理思维和现实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

在当前促消费、稳就业的重要性日益升级的大背景下，上海、深圳等城市纷纷为路边摊解禁，不无更深层次的现实考量。也正因此，在欢迎这种包容做法的同时，也应该警惕功利性的思维。应该明确，给予路边摊必要的生存空间，应该成为城市管理中持之以恒的坚守，而不是随时可以叫停。这不仅关乎市民对城市管理政策的预期，也是人们判断城市管理人性化程度，以及城市治理精细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说到底，更多地接纳包括路边摊在内的市场自发秩序，应该成为一种常识和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深圳出台的条例中还规定商场、门店超出门、窗外摆卖、经营的，应当符合规范。这也为店家“外摆”开了一道口子。这一做法，实际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它一方面是营商环境细节上的优化，另一方面也是对市民需求的顺应。比如，好天气时在室外喝杯咖啡，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不对“外摆”彻底禁绝，也可以说就是对人性的顺应。高效、现代的城市管理，就是要尽量找到秩序规范与人性与市场活力的平衡点。当然，这些突破目前仍只是在规范层面。具体执行上，如摊贩经营场所的科学划分、商业外摆的具体规范等，都需要相关部门结合实际予以细化，真正把政策善意不打折扣地送到商家和商家的手上。

从上海到深圳，一线城市不再禁绝路边摊，将引领一种新的城市治理思维，给予民生满足、市场发育提供更多包容、呵护的空间。（作者是知名媒体评论员）

发力新消费场景，“五一”广东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首席评论 □毕炯

“五一”假期，广东各地人流激增、消费增长、消费旺盛。围绕打造品牌消费节，广东各地开展“一城一节一IP”行动，举办精彩纷呈的主题促消费活动。总体上，全省消费市场增长超过预期，甚至超过了2019年同期水平。在消费者热情参与、消费市场火爆的场景中，广东经济向好态势生动呈现。

“五一”期间，广东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与经济发展整体复苏息息相关。2022年，广东全省GDP达12.91万亿元，排名全国首位，2023年一季度GDP增速4%，增速回升明显。在良好的经济基本面支撑下，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为促消费提供了旺盛的市场购买力。

热点快评 □斯涵涵

今年“五一”，广东各地政府在推动消费市场增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一方面，加大对消费领域的扶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举办各类重大消费促销活动，引导市场主体增加投入，促进消费增长；另一方面，积极打造新的消费场景，推动消费方式升级。

“五一”假期，“一城一节一IP”主题消费IP活动，如，佛山市举行2023佛山夜间消费节暨家电促消费活动，银联联合13家商业银行及多家重点企业投入超3000万元夜间消费补贴；惠州市举办“味传大湾区，佳肴荟鹏城”惠民美食嘉年华活动。

特色IP活动是各地推动消费市场回暖的重要手段之一。活动通过对本地文化、传统、特色等方面进行挖掘和包装，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消费IP，吸引游客前来消费，不仅展现了广东各地文化的独特魅力，还通过各种互动体验，让游客深入了解当地特色产品和服务，激发游客消费欲望，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今年“五一”，汽车等大宗消费备受关注，电商优惠活动成为热点，线上消费持续火爆，都取决于系列促销活动的成功举办。“五一”促销不仅助力企业完成各项既定销售目标、赢得市场份额，更形成一种消费引导，让产品品牌赢得广泛认同，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支持。

培育新消费新场景，也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措施。各地积极探索新的消费场景，如生态露营、尾箱集市等，既满足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又创造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还需看到的是，“五一”广东消费势头喜人，不仅在于针对长假所推出的各

项针对性举措得力，有效撮合商家服务与消费者需求对接，更在于广东各地市通过新型智慧商圈、数字经济等方式，积极打造新的消费场景，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例如，广州市在2019年就开始推动智慧商圈建设，目前已有广州大道商圈、珠江新城商圈、北京路商圈等多个智慧商圈建设完成，进一步提升了广州本地市民与游客的消费体验。

经济稳中有进，人民群众有了更强的获得感，见证了广东经济发展质的提升与量的增加。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的融合发展，广东消费市场将进一步壮大，让广大消费者的“购物车”拉动更多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催生新增长点，进而为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实现全年既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景区的“十年欠条”写就“诗与远方”

言在先”“一担了之”，而是先用食品简餐抚慰游客饥饿的肠胃，再用“十年欠条”留住游客失落的心，如此暖心、贴心的人性化服务，赢得网友一片点赞。

景区“十年欠条”无疑是一则良性广告。当下的旅游市场资源丰富，竞争激烈，各地政府千方百计出招招徕游客，努力提振当地旅游经济。老君山景区用美丽的风景把游客吸引来，还用优质服务、细心贴心的服务，让游客觉得不虚此行，并有好评反馈还想再来的欲望。“十年欠条”不仅提前锁定了一批游客，其正面溢

出效应也不言而喻。 网友们说得好：“格局大了，路就宽了。”常言道，金杯银杯不如游客的口碑，良好的口碑依赖于游客的口碑相传及上述的消费体验，也凸显景区经营者、管理者水平与格局。 风景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并不单独存在，只有与人相得益彰，才能融为一幅和谐的画面。景区着想，从长远考虑，于细节入手，景区“十年欠条”写就“远方”的真诚与美好，契合游客的旅游目标与期许，值得其他景区借鉴及推广。